

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

郭 东 李 琳 庞国光 乔 璐

【摘 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是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的有效手段,又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文章使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中西部县域、粮食主产县和劳务输出县中更为突出。机制分析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水平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缩小本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拉大了邻近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文章研究结论为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返乡创业 城乡收入差距 双重差分法 空间溢出效应

【作 者】郭 东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李 琳(通讯作者)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庞国光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乔 璐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最为严重(孔祥智、谢东东,202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其绝对差值高达28481元。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党的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共同体演化机制与治理体系研究”(编号:22FJLB007)的阶段性成果。

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这些政策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探讨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缩小路径对中国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是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旨在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一项代表性政策。从理论上讲,返乡农民工在个人储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往往存在较大优势,支持其创业有助于促进要素流动,激发试点地区的发展潜能(徐超等,2017)。另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共享富裕生活(赵锦春、薛业飞,2023)。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效果的研究尚未直接考察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有 3 个方面的相关发现提供了间接证据。一是返乡创业能够有效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李波等,2023)。二是返乡创业可以有效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促进经济集聚、带动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推动县域经济增长(黄祖辉等,2022)。三是返乡创业有助于推动第二、三产业发展以及吸引要素流入等途径实现农民增收(汤龙等,2024),有研究采用农村调查数据发现了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的积极效应(郑兆峰、宋洪远,2023)。然而,以上研究未能揭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作用路径,也未探析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可能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劳动力总量丰富,但劳动力资源布局和市场分割问题突出,仍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背井离乡”,未能有效推动县域发展。在此背景下,推行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否助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些问题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力图从以下方面扩展研究:一是将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从产业结构升级、融资约束缓解和创新水平提升的视角探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二是以全国县级单位为研究样本,降低了省级或市级单位研究未观测的异质性,为评估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更精细的证据;三是从区域、县域特征(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是否为劳务输出县)等多重视角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识别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敏感人群;四是在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尝试运用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 政策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大量劳动力流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这些现象在加速东部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拉大了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不少流出地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资源匮乏和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边缘化情况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为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于2016年2月、12月和2017年10月分别批复设立了90、116和135个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地区^①,并不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对试点地区进行评估、监测、考核和开展返乡创业经验交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政策便利和创业保障,以实现“引凤还巢”,具体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创业培训等。

根据中国政府网的统计数据,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 010万人,比2019年增加160万人,同比增长19%。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助于推动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下乡”,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和信息鸿沟,从而帮助经营者和消费者实现信息交互对接,挖掘农村市场潜力,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带来的先进生产理念能够在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下催生新产品和新服务,进一步盘活县域资源,推动试点县域经济转型,促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发展,拓展农民增收渠道,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如此,具有一定资金积累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还为农村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王轶等,2020),从而带动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二)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1.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城乡融合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驱动力,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体来看,在生产端,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带动技能培训和转移,推动技能、经验和管理知识下沉到农村地区,为扎根农村的企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带来新的动力,从

^① 参见《第一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第二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和《第三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

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另外,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助于增加农村创业机会,尤其是新兴产业和服务业,这将有助于打破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非农收入水平(汤龙等,2024)。在消费端,政策的实施伴随着“消费下乡”和“品牌下乡”,即农村消费升级和农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这就意味着,乡村需要提供更多种类和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由此会倒逼农村企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提高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水平,推动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行业快速发展,从而有效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黄祖辉等,2022)。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2. 缓解融资约束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是缓解融资约束和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资金是县域创业的重要决定因素。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缺少抵押品和信用担保,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中融资,这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魏滨辉等,2023)。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为试点县带来大量资金资助,缓解其融资约束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而言,一方面,实施政策使试点县获得大量政府和银行的扶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创业小额贷款等财政和金融扶持政策,这将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创业成本并提高创业成功率,从而提高试点农村地区的市场活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返乡创业者往往具有一定的资金基础、人脉和较好的市场洞察力,不仅能够带动资金下乡,激励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投资,还有利于填补农业农村领域的“投资洼地”,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徐超等,2017)。此外,返乡创业者能够为试点地区带来先进的数字化理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农村市场,从而弥补传统金融发展固有的“市场缺陷”,缓解传统金融对农村地区的条件、地理及营销排斥,服务农村“长尾群体”,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琳等,2024)。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从而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3. 提高创新水平

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Kosempel,2004)。技术创新作为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农民工返乡创业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助于试点县更新创新理念、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业态模式、普及创新文化和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其一,返乡创业者能够引入创新理念、前沿技术和市场营销理念,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提高当地的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其二,返乡创业者往往能够引入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创新资源,并激发当地的创新活力,

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黄祖辉等,2022)。其三,返乡创业者带来的新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产品创新有助于带动新的产业发展和商业活动,提高当地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其四,返乡创业者的成功案例和经验分享有助于促进创新文化的培育和传播,提高创新创业的成功率和成果转化率,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内生动力。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提高县域创新水平,从而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研究期限设为2008~2021年,研究对象为中国2362个县(市、区)。研究所需的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针对个别县(市、区)出现的数据缺失问题,本文采用均值法或线性趋势法进行插补。本文的专利授权量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国专利公布公告,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参考余泳泽和潘妍(2019)的研究,本文选取相对值的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度量,采用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使用以200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收入指标进行了平减处理。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结合设立时间先后统一赋值,生成试点政策变量。其中,各县在入选试点县当年及之后的年份试点政策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3. 机制变量

理论分析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可能通过3个路径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本文采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与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之比的对数来表示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即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相对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越多,当地产业结构层次越高。其次,本文选择县域年末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对数作为融资约束的替代变量,年末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越多,意味着越容易从金融机构贷款,融资约束越小。最后,本文选择县域专利授权数量的对数来衡量县域创新水平。为避免0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县的专利授权数加1取对数。

4. 控制变量

本文还选择了潜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是对外开放水平,采

用县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对数来表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开放水平成为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消费潜力,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仅反映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三是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该指标反映了县域经济实力,也是反映县域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标。四是城镇化率,本文选择县域城镇人口占县域总人口之比表示。城镇化的发展能够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收入,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五是财政支持力度,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对数表示。财政支持力度会影响政府调控经济的效果,从而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 1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县域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32.632 和 0.084,表明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差距较大。据统计,2008~2021 年分 3 批累计支持 341 个县开展返乡创业政策试点;由于部分县域数据缺失,实际使用的有效样本为 2 362 个县,其中包括 318 个试点县,占 13.46%。这些数据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表 1 主要变量的操作化方式与描述性统计(N=33068)

变 量	衡量方式	均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0.477(0.347)	0.084	32.632
产业结构升级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与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之比的对数	0.083(0.968)	-5.606	8.664
融资约束	年末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对数	13.370(1.248)	6.588	18.759
创新水平	专利授权数量的对数	1.679(1.712)	0	9.213
财政支持力度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对数	1.481(3.195)	0	115.432
对外开放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对数	0.001(0.082)	0	10.200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0.046(0.163)	0.002	17.646
消费潜力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	1.574(1.973)	0.004	39.921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	0.286(0.205)	0.006	0.987

(三)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参照 Lu 等(2013)的模型设计,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URIG_{it}=\alpha+\beta DID_{it}+\theta X_{it}+\mu_i+v_t+\varepsilon_{it} \tag{1}$$

其中, i 表示县, 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URIG_{it}$ 表示 i 县在第 t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 DID_{it} 为相应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如果入选试点县并已经实施政策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X_{it} 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对外开放水平、消费潜力、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财政支持力度等。 μ_i 表示县域固定效应, v_t 表示年份固定效

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不仅会对所在地产生影响,还可能对邻近县域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本文将在传统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进行拓展性分析:

$$URIG_{it} = \alpha + \rho WURIG_{it} + \beta DID_{it} + \theta 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tag{2}$$

其中, W 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 $WURIG_{it}$ 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ρ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表示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其他变量与式(1)相同。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汇报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影响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表 2 中模型 1 不加入任何相关控制变量,仅将政策效应变量放入模型中,模型 2 则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模型 3 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缩小了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支持了林嵩等(2023)的研究结果。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之所以能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是由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为试点县提供更多机会、潜力和财富积累,从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姚旭兵、邓晓霞,2020)。而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助于提高试点县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积累,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贡献内生增长力量。由此,本文验证了研究假设 1。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同类研究相近。以模型 2 为例,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县域对外开放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但在县域层面可能存在各种因素的抵消作用以及县域经济发展内部不平衡问题,导致这种正相关性变得不显著。消费潜力和财政支持力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城乡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在上升,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农村地区的

表 2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影响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N=33068)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0.014*** (0.005)	-0.014** (0.006)	-0.014*** (0.004)
对外开放水平		-0.004 (0.003)	-0.004 (0.003)
消费潜力		-0.005*** (0.001)	-0.005*** (0.001)
经济发展水平		0.001 (0.005)	0.001 (0.002)
城镇化率		0.201*** (0.015)	0.201*** (0.032)
财政支持力度		-0.005*** (0.001)	-0.005*** (0.001)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模型 3 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次)的稳健性标准误。回归模型均控制了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下表同。

经济活力可能得到提升,而且随着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加大,如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得以快速提高,从而有助于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邓金钱、蒋云亮,2024)。城镇化率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为正。究其原因在于,城镇化率的提高可能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减少,降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尹晓波、王巧,2020)。在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城市经济发展快于农村,城镇化也可能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验证平行趋势假设、厘清试点的政策效果,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进行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URIG_{it} = \alpha + \sum_{j=-3, j \neq -1}^{j=3} \beta_j Treated_{it}^j + \theta 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tag{3}$$

其中,变量 $Treated_{it}^j$ 表示 i 县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第 j 年的时点虚拟变量。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本文将政策实施之前 3 年以上的数据合并到事前 3 年,并将事前 1 年作为基期。其余变量含义与式(1)一致。

从图 1 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来看,政策实施前 3 年的政策效应参数并不显著,即试点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在实施后的第 3 年显著为负,说明该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2. 置换检验

参考于斌斌和胡雅静(2023)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置换检验进一步验证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来自其他不可观测因素。该方法是在样本中随机抽取与原实验组数量一致的“伪实验组”,假设这些样本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发生的县域,其他县域作为对照组。重复抽样 500 次后对样本进行反复估计,最终得到 500 次“伪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图 2 显示,回归系数集中分布在 0 值左右,显著异于基准回归模型 2 的系数(-0.014),表明基准研究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3.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

为了更好地选取对照组,尽量减少选择性偏误,本文选择使用 PSM-DID 分析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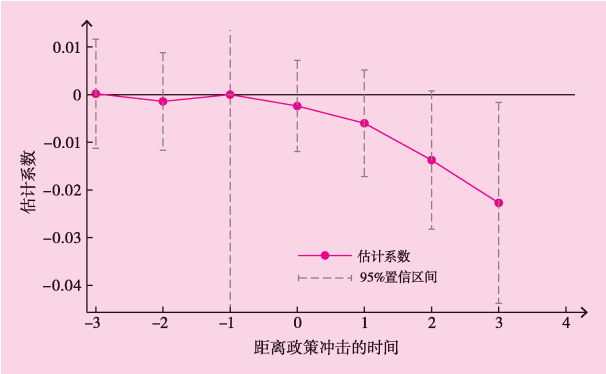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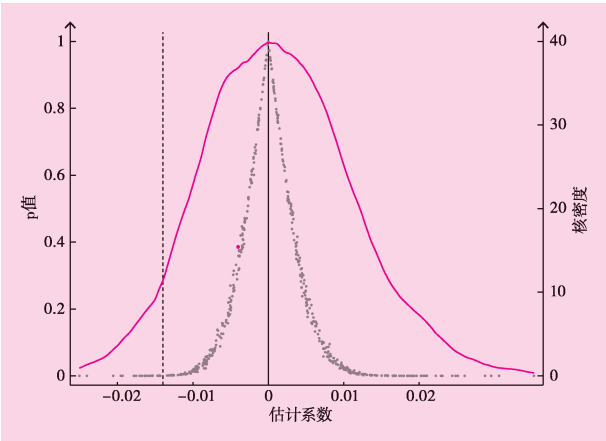


图2 置换检验结果

注:图中垂直虚线代表基准模型的估计系数。

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考虑到政策实行时点的不一致,本文进一步使用逐年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匹配变量主要考虑了对外开放水平、消费潜力、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财政支持力度。表3的模型4至模型6汇报了1:2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所得到的政策效应。结果显示,不同匹配方法得出的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估计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 剔除特殊样本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由于在行政上的特殊性,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政策与财政支持,这些特殊样本可能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剔除以上城市所管辖的县来避免城市行政级别的特殊影响。模型7的结果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依然显著,说明基准结果不是由少数特殊样本造成的。

5. 缩尾处理

为了排除离群值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按照1%和99%的标准,对被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模型8的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估计系数仍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6. 更改样本区间

本文样本时间跨度为2008~2021年,而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发生在2016和2017年,可能因政策冲击前的时期过长而造成估计偏误。因此,本文借鉴黄祖辉等(2022)的处理方法,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13~2021年,重新进行估计。模型9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PSM-DID			剔除特殊样本	缩尾处理	更改样本区间
	1:2 近邻匹配	核匹配	半径匹配			
农民工返乡	-0.022**	-0.015***	-0.015***	-0.009*	-0.007**	-0.016***
创业试点政策	(0.011)	(0.006)	(0.006)	(0.005)	(0.003)	(0.006)
观测值	4429	32756	32643	28053	33068	21258

注: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与表2模型2相同,且均控制了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如无其他说明,下表同。

归结果非常接近,说明更改样本的区间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三) 机制检验

1. 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检验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检验估计结果见表4。模型10和模型11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推动技能、经验和管理知识下沉农村地区,带动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打破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推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助力农民增收。更为重要的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能够带动农村地区消费结构升级和品牌意识树立,其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升将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伴随产业结构升级涌现的数字农业、电子商务、观光旅游业,能有效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吴万宗等(2018)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即产业结构越合理,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就越小。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城镇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促使产业向低成本的农村地区迁移,这会增加农村居民的就业机会,从而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杨晶等,2018)。因此,本文验证了研究假设2。

2. 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

模型12和模型13汇报了缓解融资约束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影响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缓解了县域融资约束。这意味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县能够依托政府扶持来获得大量的财政和金融支持,从而缓解创业融资约束,提高创业成功率。不仅如此,农民工返乡创业还有助于推动资本要素从城镇流向农村,实现“回乡一人,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目标,从而提高农业农村投资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何宜庆等,2022)。此外,返乡创业者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在试点县的发展,从而为农村创业者提供了便捷的支付和资金管理方式,进而降低融资门槛和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和便捷性。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下,融资约束的缓解往往对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即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助于提高试点县的创业活跃

表4 机制检验结果(N=33068)

变 量	模型 10 产业结构升级	模型 11 收入差距	模型 12 融资约束	模型 13 收入差距	模型 14 创新水平	模型 15 收入差距
农民工返乡创业 试点政策	0.022* (0.012)	-0.014** (0.006)	0.080*** (0.008)	-0.011** (0.005)	0.067*** (0.023)	-0.013** (0.006)
机制变量		-0.011*** (0.004)		-0.036*** (0.010)		-0.016*** (0.002)

度,从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周利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数字红利”。不仅如此,试点县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将加剧银行间竞争,从而使银行为提升市场占有率而降低贷款利率,这有利于提升创业者的金融可得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王修华、赵亚雄,2023)。因此,本文验证了研究假设 3。

3. 提高创新水平的机制检验

模型 14 和模型 15 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创新水平,从而缩小了县域内的城乡收入差距。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随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试点县将更有机会获得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创新资源,通过聚集创新资源要素、构建本地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创新生态环境等方式来提高试点县的创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返乡创业者对新兴技术和科研成果的敏感性能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推动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瓶颈,提高试点县的技术竞争力。县域创新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农民增收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管永昊等(2020)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创新和工艺创新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赵峥等(2018)的研究结论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即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体而言,技术创新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大量发展机会,其不仅表现为创新赋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医疗教育保障建设,还表现为化解信息不对称和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从而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方向。因此,本文验证了研究假设 4。

(四) 异质性检验

1. 区域异质性

为识别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影响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子样本。表 5 的模型 16 和模型 17 的估计结果显示,区域差异会显著影响政策效果,即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更显著的抑制作用。究其原因,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其先进生产要素产生的集聚效应与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更为明显,因而导致政策效果难以显现出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技术、人才和资本约束,尤其缺乏经济转型所需要的内生动力,这使中西部地区面临的产业转型滞后、文化基础薄弱和科技水平低等阻碍愈发严重,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面临较大瓶颈。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这些地区带来了大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的劳动力,其不仅能带动农村地区就业,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优化县域产业结构,还能改变农村经济结构,并且逐渐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生力军。

2. 是否为粮食主产区

相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其中农业收入与粮食产量

密切相关。因此,为验证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与样本为粮食主产区相关,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位于粮食主产省的县(后文简称粮食主产县)和位于非粮食主产省的县(后文简称非粮食主产县)两个子样本^①。表 5 的模型 18 和模型 19 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粮食主产县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非粮食主产县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新的致富途径,也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相比于非粮食主产县,粮食主产县农民的收入更多地来自农业收入。然而,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大、风险高等问题,农民的收入并不稳定。在此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可以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能打破传统思维桎梏,拓展农产品供货与销售渠道,促进实现富民增收的目标。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在粮食主产县更明显。

3. 是否为劳务输入县

随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农村劳动力返乡回流趋势在不同县域存在差异,因而也可能对劳务输入和输出县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位于劳务输入省的县(后文简称劳务输入县)和位于劳务输出省的县(后文简称劳务输出县)两个子样本^②,估计结果见表 5 的模型 20 和模型 21。由此可见,在劳务输出县,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之则不显著。原因在于,相比于劳务输入县,劳务输出县面临的人才流失情况更为严重,这限制了劳务输出县的经济转型;而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激发了农民工的返乡创业热情,其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活力和返乡人口红利(魏滨辉等,2023),还有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伴随着劳动力回流的不仅有大量先进生产要素,还有劳务输出地急需的市场信息和现代化思想观念,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林亦平、魏艾,2018)。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 量	模型 16 东部	模型 17 中西部	模型 18 粮食主产县	模型 19 非粮食主产县	模型 20 劳务输出县	模型 21 劳务输入县
农民工返乡	-0.019	-0.016***	-0.020**	-0.002	-0.021***	-0.007
创业试点政策	(0.014)	(0.005)	(0.008)	(0.007)	(0.005)	(0.008)
观测值	11718	21350	18746	14322	11410	21658

① 粮食主产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山东省、四川省、江苏省、河北省、吉林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西省和辽宁省。
 ② 劳务输出省: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贵州省、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五) 进一步讨论:空间效应识别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有助于打破“行政壁垒”,从而提升要素流动效率。政府支持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是从国家层面破解区域要素流动壁垒的重要手段。伴随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区域流动壁垒将会迎刃而解。这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试点县域抓住机遇进行改革,不断增强自身发展实力,从而加剧了本县对邻县要素的“虹吸效应”,拉大邻县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表现为试点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二是邻县积极学习并吸收试点县的先进发展经验,努力缩小与试点县的发展差距,从而实现自身实力的提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主要表现为试点政策的“正向溢出效应”。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

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需要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为此,本文计算了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结果如表 6 所示。从测度结果可以看出,Moran’s I 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满足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和适用条件。

2. 空间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使用空间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分别进行了似然比检验、Wald 检验,确定了空间计量分析采用空间杜宾模型(Anselin 等,1996)。其次,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为本文的最优选择。最后,本文进一步采用似然比检验考察具体的

固定效应形式,最终确定时间和县域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为空间效应识别的基准模型,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7。

表 8 汇报了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的自回归系数 ρ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即各县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避免点估计系数存在偏误,本文进一步利用 SSDM 模型将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

表 6 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份	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年份	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2008	0.090***	2015	0.073***
2009	0.082***	2016	0.073***
2010	0.076***	2017	0.066***
2011	0.074***	2018	0.054***
2012	0.080***	2019	0.041***
2013	0.073***	2020	0.028***
2014	0.073***	2021	0.019***

表 7 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

检 验	统计量
豪斯曼检验	48.88***
似然比检验(空间杜宾模型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	479.97***
似然比检验(空间杜宾模型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498.45***
Wald 检验(空间杜宾模型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	20.61***
Wald 检验(空间杜宾模型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331.48***
似然比检验(双固定模型退化为县域固定模型)	72.39***
似然比检验(双固定模型退化为时间固定模型)	17675.88***

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解(Lesage等,2009)。结果显示,直接效应的系数显著为负,而间接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以上发现意味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显著抑制本地城乡收入差距,但可能拉大邻近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其原因在于,当返乡者选择在当地进行创业时,可能会带回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商业模式,缩小当地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资源的趋利性可能导致周围县域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向创业地区流动,从而对周围县域形成“虹吸效应”,拉大邻近县域内部的发展差距。

表 8 空间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N=33068)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0.022**(0.010)	1.559*** (0.277)	1.537*** (0.274)
ρ		1.448*** (0.007)	
σ^2		0.104*** (0.001)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8~2021 年的中国县域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相比于东部县域、非粮食主产区和劳务输入县域,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在中西部县域、粮食主产县和劳务输出县更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机制分析发现,融资约束缓解、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水平提升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这一政策能显著缩小本地城乡收入差距,但拉大了邻近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返乡创业政策体系,完善创业保障,实现“筑巢引凤”的目标。例如,完善返乡创业平台,建设现代化农业园区及融合示范区;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以改善创业环境;加强创业培训,实施“领头雁”计划,建立返乡创业者信息库并定制培训项目。第二,因县制宜探索差异化的返乡创业实施策略。东部地区要合理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鼓励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者返乡创业。中西部、劳务输出县和粮食主产县则要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推动装备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重点产业发展,解决人才落户创业后顾之忧。第三,围绕返乡创业影响收入差距的路径,精准施策。具体而言,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推动农产品全链条智能化;挖掘本地优势,结合“互联网+农村”理念促进旅游与农产品融合,优化试点地区产业结构;明确返乡创业者同等享受政策扶持,强化金融支持缓解融资难;积极参与国际农业科技

交流,提升科研投入与人员待遇,并且鼓励高校与龙头企业在农村设立实训基地,拓宽创新创业路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四,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和完善部门协调机制,合理引导返乡人才创业项目,鼓励县与县的沟通与交流,避免试点县对周围县形成“虹吸效应”;加大地方财政对非试点县的倾斜支持力度,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来避免市场流动导致的极化效应,把“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效应”。

参考文献:

1. 邓金钱、蒋云亮(2024):《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2. 管永昊等(2020):《企业创新类型、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
3. 何宜庆等(2022):《政府推动型返乡创业能否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基于双重差分的经验评估》,《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4. 黄祖辉等(2022):《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5. 孔祥智、谢东东(2022):《缩小差距、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6. 李波等(2023):《返乡创业如何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政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7. 李琳等(2024):《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影响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县域证据》,《经济与管理研究》,第4期。
8. 林嵩等(2023):《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3期。
9. 林亦平、魏艾(2018):《“城归”人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补位”探究》,《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10. 汤龙等(2024):《返乡创业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吗?——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农业技术经济》,第7期。
11. 王修华、赵亚雄(2023):《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经济研究》,第9期。
12. 王铁等(2020):《创业者人力资本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基于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经济经纬》,第6期。
13. 魏滨辉等(2023):《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14. 吴万宗等(2018):《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第2期。
15. 徐超等(2017):《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CHIPS数据的证据》,《财经研究》,第12期。
16. 杨晶等(2018):《产业结构升级、财政支农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问题探索》,第7期。
17. 姚旭兵、邓晓霞(2020):《农村人力资本、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18. 尹晓波、王巧(2020):《中国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分析》,《经济地理》,第3期。
19. 于斌斌、胡雅静(2023):《撤县设区的产能过剩化解效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7期。
20. 余泳泽、潘妍(2019):《高铁开通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异质性劳动力转移视角的解释》,

《中国农村经济》，第 1 期。

21. 赵锦春、薛业飞(2023):《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 CMDS 数据的经验证据》，《南京社会科学》，第 10 期。

22. 赵峥等(2018):《技术创新、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科技论坛》，第 10 期。

23. 郑兆峰、宋洪远(2023):《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 6 期。

24. 周利等(2020):《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经济学家》，第 5 期。

25. Anselin L., Bera A.K., Florax R., et al.(1996), Simple Diagnostic Test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6(1):77-104.

26. Kosempel S.(2004),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5(1):201-220.

27. Lesage J.P., Pace R.K.(2009),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 Boca Raton:Chapman & Hall/CRC, 11-85.

28. Lu Y., Tao Z., Zhang Y.(2013), 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1(2):290-300.

Does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es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ounties ——Evidence from the Pilot Policy of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es

Guo Dong Li Lin Pang Guoguang Qiao Lu

Abstract: Guiding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and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labor market mismatch,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th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echanism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policy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y using Chinese county data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the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is result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reduction i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ounties, the main food-producing counties, and the labor-exporting counties. The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the policy can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y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policy,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local counties, whereas widen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neighboring counties.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evidence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policy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 and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Keyword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 Urban-Rural Income Gap;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责任编辑:许 多)